

SANLI SANZHUAN
LIANZHENG SIXIANG YANJIU

“三礼”“三传”

廉政思想研究

何山石/著

深度解读《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
《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中的廉政思想

十三经中的诸多与治国理政相关的资源，密集地出现在中国大国政治生活的话语中，这既是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的重要表征，又极其生动地表明了中国的政治生活是需要从十三经这样的典籍中寻找理据的。



人民出版社

“三礼”“三传”

廉政思想研究

SANLI SANZHUAN
LIANZHENG SIXIANG YANJIU

何山石/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礼”“三传”廉政思想研究/何山石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01-018834-8

I. ①三… II. ①何… III. ①廉政建设-哲学思想-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B2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6265 号

“三礼”“三传”廉政思想研究

SANLI SANZHUAN LIANZHENG SIXIANG YANJIU

何山石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

字数:350 千字

ISBN 978-7-01-018834-8 定价:4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内 容 简 介

Brief Introduction

本书是对“十三经”典籍系统中的《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廉洁治理思想的集中梳理，是对“三礼”“三传”中有益于当代社会廉洁治理之内容的集中挖掘；而此前推出的《十三经廉政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6 年 12 月版）一书，则重在对“十三经”典籍系统中的《周易》《尚书》《诗经》《论语》《孟子》《孝经》廉洁治理思想的集中梳理，两书共同构成作者对“十三经”典籍系统中的廉政思想的完整研究。

本书由重庆工商大学重庆廉政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前 言

对“十三经”典籍系统中的《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廉洁治理思想的梳理,是本人“十三经廉政思想研究”这一整体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十三经”典籍系统中的《周易》《尚书》《诗经》《论语》《孟子》《孝经》廉洁治理思想的研究(《十三经廉政思想研究》),已先行梓印,《“三礼”“三传”廉政思想研究》接续完成,甚为快意!

本书对《周礼》廉政思想的阐释,着力于《周礼》一书的制度伦理、治官思想、官吏考核以及《周礼》财政管理中的腐败防范与控制等层面的研究。《周礼》是“十三经”典籍系统中最具制度建设热情的经典,《周礼》的制度设计,将中国人的哲学观念与治理理想,如盐入水般地化入其中,如以中国的天地思想支撑全书的架构,以阴阳合谐的系统论观念统摄六官的治理实践,以公平正义作为最基本的制度精神,等等,都是《周礼》极引人注目的特征。这些特征中寓意深远的廉洁治理追求,本书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同时,将《周礼》官吏管理、考核、教育等诸多层面的廉洁控制,单独拈出,集中论析,以见出《周礼》的设计者,在进行制度建设时,充分考虑到廉洁对维系制度的稳定与健康是何其重要。华夏文明,能历数千年发展而延续至今,最为重要者,乃因为华夏文明的发展有健全的制度体系为保障,制度健全,又源于制度设计始终将廉洁治理的理念坚持不懈地贯注其中。《周礼》这样的制度设计理念,是当代社会治理应该吸收的。

对《仪礼》廉政思想的分析,以《仪礼》中昏、冠、丧、祭、乡、射六种最为常见的礼仪形态为分析目标,对这六种礼仪中蕴含的廉洁治理思想进行挖掘,如冠礼与成人、治人的关系,丧礼、祭礼与民风淳朴的关系,乡饮酒礼与乡贤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等等。让国人适度地回归有仪式感的生活,对社

会风气的淳化、文明乡风的构建以至风清气正的治理环境的形成,均有助益,这或许是我们当代阅读《仪礼》的根本意义所在。

《礼记》中丰富的廉洁治理思想,洒落在“曲礼”“檀弓”“王制”“大学”“中庸”等四十九篇文献中。《礼记》是仪礼之邦的华夏子孙习“礼”之后的所思、所感、所悟、所得,之中对礼的本质与功用,对中国人独特的礼法观念,对礼治与廉洁、乐治与廉洁的关系,都有透辟的理解。《礼记》之所以会超越《周礼》《仪礼》而成为更流行的经典,就是因为《礼记》之精义丰沛,上自齐家治国平天下,下迄黎庶百姓修身养德,都能从中找到资源。正是因为《礼记》能带给国人更多的精神启发和智性养分,所以更具亲民性,更易流行而成为经典。当代人,包括主政一方的官员,将《礼记》作为常习之经典,不断从中获取智慧力量,是极为必要的。

在“春秋三传”以至“十三经”典籍系统中,《左传》部头最大,廉洁思想亦最为丰富。《左传》不仅借助阐发“春秋大义”来寄寓廉洁治理的追求,而且,在自己庞大的文本中对贪、贿、赂等官场痼疾进行了大量记载,对“政以贿成”之乱政生态多有揭示,对预防与惩治腐败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左传》中诸如此类的廉政思想,值得当代人认真总结与梳理,以推进当代社会的廉洁治理进程。《左传》是善于讲故事的经典,颖考叔、宫之奇、管仲、晏婴、子产、叔向等故事,千古流传,丰富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当代人要向《左传》寻找智性力量,讲好《左传》故事,不失为有效之途径,可以说,只有能讲好《左传》故事,才有可能接近《左传》的思想。

《公羊传》一直是以“治术”性身份传世的,公羊学研究者,关注最多的也是《公羊传》中能启发社会治理的成分,钱穆曾指出西汉公羊学家“皆以经术通政事”,其实,这一判断完全可置评历代公羊学家的研究志趣。本书对《公羊传》中的“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等公羊学命题中的廉洁意蕴进行了挖掘,如“大一统”思想与维护国家统一,“通三统”与制度革新,“张三世”的善治、廉洁诉求,等等,进行了分析,同时,对当代公羊学研究“接着讲”,即公羊学的当代延展这一问题,也提出了看法。

在“《春秋》三传”中,《穀梁传》的发展最为沉寂,但《穀梁传》的廉洁思想并非不丰富。通过与《春秋左传》《公羊传》“二传”的对读,《穀梁传》中

的清、正思想,《穀梁传》的尚贤思想与德性内涵,《穀梁传》的重民思想,等等,都会慢慢呈现出来,对《穀梁传》的廉洁涵意,也会有颠覆性体认。

以上是对本书研究框架与致思路径的大致说明。“十三经”典籍体系长期雄踞于国人的精神空域之中,经学更是中国学术传统中的大端,载籍丰富,成果山积,然而,对“十三经”廉政思想作全景式审视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本人学养所限,虽无法对研究对象作穷形尽相的研究,目前呈现的成果,也更仰赖于同行学人的指正与丰富,然窃意为,本人的探究努力,视为对经学研究一定程度的丰富,则并不为过。

作者简介

About the Author

何山石，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庆廉政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岳阳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钱钟书研究。近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主要有：《钱钟书〈管锥编〉的民俗视野考论》《〈管锥编·周易正义〉涉典考释与评注》《十三经廉政思想研究》《诺贝尔奖与中华传统智慧》《大学书法概识》《中国社会生活史》《名人文化研究读本》《外国文学》（编著，参编）。在《出版发行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近二十篇。

责任编辑：洪琼

封面设计：林芝玉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周礼》:制度治廉的集大成之作	1
第一节 《周礼》制度伦理意义探掘	1
第二节 “天官冢宰”的治官思想与廉政追求	12
第三节 《周礼》其余“五官”的廉政设计	26
第二章 《仪礼》:仪式感的适度回归助推当代社会廉洁治理	51
第一节 《仪礼》的“重仪节”性及其在“三礼”中的地位	52
第二节 冠、昏二礼的廉洁解读	58
第三节 丧、祭礼仪的廉洁解读	73
第四节 “和于乡、射”:乡、射礼仪的廉洁解读	92
第三章 《礼记》:学“礼”生活的集体记忆与廉政表达	110
第一节 礼为法:礼治即廉洁	111
第二节 《大学》《中庸》的廉政思想研究	130
第三节 《乐记》:乐治与廉洁	146
第四节 《礼记》教育思想对当代官员学习生活的启鉴	160
第四章 《左传》:廉政思想“艳而富”	176
第一节 廉洁:“《春秋》大义”阐释史中的必然维度	177
第二节 《左传》论“贪”“贿”“赂”	189
第三节 《左传》治腐惩贪机制研究	207
第四节 讲好《左传》故事——《左传》智性力量的现代转化	223

第五章 《公羊传》：“经术通政事”的廉政诉求	236
第一节 《公羊传》“实学”化进程中的廉政阐释维度	237
第二节 《公羊传》“大一统”等治理命题的廉政追求	248
第三节 《公羊传》重制度建设的特质及公羊学的当代延展	266
第六章 《穀梁传》：唤醒“清”廉记忆	273
第一节 《穀梁传》对《春秋》的评价及其廉政命意——与 《公羊传》对读	274
第二节 《穀梁传》之“正”：秩序化追求中的廉政构意	286
第三节 《穀梁传》“赂”论等廉政思想分析	299
参考文献	308

第一章 《周礼》:制度治廉的 集大成之作

在“十三经”中,《周礼》是唯一的最系统、最成熟的官僚制度设计专典,之中高度的制度设计智慧、精巧的官吏监督考评指标等,都使得它成为特异的存在。虽然,学界对《周礼》的产生时间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周秦之际说、西汉说等,但将《周礼》视作中国国家制度建设的源头性文献,完全能够成立。华夏文明延续了几千年,只有具备了成熟的制度文化,民族国家才有可能长期稳定向前滑行,不致中途崩塌。

《周礼》设官分职,充分考虑到了官吏腐败这一极危险因素对整个体系的伤害,所以,每一个环节的设置都将官吏廉洁的要求渗透进去,以维护整个体系的健康。深度总结《周礼》中的廉政思想,对当下的廉政建设必将有极大的启发。

第一节 《周礼》制度伦理意义探掘

朱熹曾说:“《周礼》一书好看,广大精密,周家法度在里。”^①所谓“周家法度”,在更多的时候,中国的学术传统一直将之视为“周家制度”,诚然,在“十三经”这一典籍体系中,《周礼》宏阔的制度特征,是其他诸经所无法比肩的。

中国“礼仪”之邦的“礼仪”,发展成为《周礼》所载录的“礼制”,最为生

^① (宋)朱熹:《朱子全书·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912页。

动地说明了华夏先民制度建设的热情。《周礼》之“礼”，超拔于“礼仪”之礼，立足于国家礼制，由礼仪上升为礼制，成为带有强制性的国家制度，礼制便成为一种强大的维护稳定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强劲地推动着华夏文明向前发展。

如果说礼仪更多具有仪式感，那么，礼制便要落到现实政治操作这个层面。比如“籍礼”，“在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公社中，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活动而集体耕作时，都是由族长和长老带头进行的。在每种重要的农业劳动开始时，往往由族长主持一种仪式，以鼓励和组织氏族成员集体劳动。因为当时是‘民之大事在农’，而族长的主要任务是‘唯农是务’，有着‘教民尊生产’的责任。”^①籍礼进入仪式化阶段后，只需要有一个象征性的耕作行为即可。而籍礼进入“礼制”阶段，即成为国家制度时，这种仪式感被保存，即君王百官只要象征性地耕作即可，但更为重要的是，籍礼是必须举行的，带有强制性，而且，举行籍礼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蕴。《国语·周语》载，举行籍礼之前九日，“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坛于籍，命农大夫咸戒农用”。司徒要层层告诫，准备好农具。最重要的是，行籍礼后：“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修其疆畔，日服其镈，不解于时，财用不乏，民用和同。”所以，籍礼不仅仅是象征性的，更是动员性的，是要使全国整体行动，进入春耕，“恪恭于农”，“不解于时”。而且，动员令之后，派遣官吏层层巡视，对整个春耕活动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若有怠农之举，必加严惩。由此可见，籍礼一旦成为国家礼制，其最终的立足点，必然服从于现实的国家治理需要，而不仅仅是一种仪式行为。

正如《周礼》研究者指出的，《周礼》涉及的范围极其宽广：“《周礼》涉及范围广泛，举凡天文历法、城乡建置、政法文教、礼乐兵刑、征赋度支、宫室车服、农商医卜、工艺制作以及各种职官、名物制度，几乎无所不包，是研究先秦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对后世政治制度影响极大。北周迄清代国家吏、

^①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230页。

户、礼、兵、刑、工六部制度，即本于《周礼》之六官。王莽改制、宇文泰改革、王安石变法，皆将其奉为圭臬。因此，它是研究我国古代政治制度不可缺少的宝贵文献，亦备受历代封建统治者重视。”^①所以，对《周礼》的体认，更应该看到它的制度意义与政治实践功能，特别是在当下追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更应该吸收其制度性智性因素，给当下的治理活动带来尽可能多的启发。

《周礼》的制度意义也是不停地受到质疑的，如刘起鈇《古史续辨》中指出：“历史上虽说有刘歆同诸博士七十余人建议王莽因‘发得《周礼》’而照样制礼作乐，建立庶官。但王莽所建官制，是自己乱据古意七拼八凑、奇形怪状形成的。真正依仿周官只建立了几个卒正、连率等小官。实际上他没有真正实行《周官》。直到西魏的宇文泰当政，笃于复古，便全仿《周礼》建立六官，自己当了大冢宰。他的儿子建立北周，完全沿用六官之制。这都是一位学者苏绰为他们创拟的。这是《周礼》所定官制在中国历史上唯一获得实行的一次。”^②刘起鈇还进一步以唐代官制为例论证《周礼》有其制度构想却未获真正实践：“到唐代开元年间，诏修官制之典。而唐代官制，实际是沿隋代所承秦汉以来三公九卿之制而有演变发展所形成的。它实行的是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之制，只是在尚书省这一部门下有吏、礼、兵、户、刑、工六个部曹，在大的官制系统上，它与《周礼》官制系统原是完全不同的，但却照按《周礼》六官编写。”^③确实，《周礼》的制度构想，不一定会被完全照搬到封建王朝的政治构架中，但历代王朝都依傍《周礼》，是因为《周礼》能给当时的制度建设带来启发，能给当时的治理提供依据。当代从传统中汲取智慧，也不是去复制已有的制度模块，而是要吸收渗透于《周礼》诸经典中能给当下带来无穷启悟的政治智慧。当然，《古史续辨》的作者也指出了：“不过，自隋历唐至宋，在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宰相制之下，于负行政之责的尚书省下分设办理具体行政事项的六曹，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顺序各代略异，至宋始确定此顺序）。元代中书省亦置此六部，至明、清

① 王锷：《三礼研究论著提要》，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 页。

② 刘起鈇：《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24—625 页。

③ 刘起鈇：《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25 页。

两代则以此六部为政府最高一级组织,且亦习惯上称此六部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这些都是受《周礼》影响所成的,可见《周礼》一书终于在中国官制史发挥了巨大作用。”^①自隋至明清,中国官制史都受到《周礼》的影响,“发挥了巨大作用”,《周礼》在中国制度文化中的巨大意义,不可抹杀。

对《周礼》制度意义的这种质疑声音,也绵延入当代生活中,比如,当代人如何学习、接受《周礼》的问题。面对《周礼》中如此繁复的官职设计,当代人既有因时代久远文句理解困难的无力感,更有《周礼》之中的某些内容不适合当代生活而产生的疏离感,因对《周礼》这样的经典阅读以至智慧汲取会偏离本有的轨道,对传统典籍以及传统文化的理解会产生很大的偏差。

钱穆曾经指出:“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一即《唐六典》。前书为中国先秦时代人之‘乌托邦’,纯系一种理想政府的组织之描写,亦可谓是一部理想的宪法。其最堪重视者,乃为政治理想之全部制度化,而没有丝毫理论的痕迹,只见为是具体而严密的客观记载。我们读此书,便可想见中国古代人之政治天才,尤其在不落于空谈玄想,而能把一切理论化成具体事实而排列开来之一层。所以《周礼》虽不是一部历史书,不能作为先秦时代的制度史看,而大体上实是一部理论思想的书,应为讲述先秦政治思想之重要材料。至于《唐六典》,则确已是唐代实际的行政法规,为唐代政府所真实遵循。虽富理想而已成事实。只由《周礼》而演进到《唐六典》,这一步骤,也可认为是中国政治历史上一极大的进步。但我们谈《唐六典》的,仍不应仅当它是一部历史书,为记载唐代现实制度的书,而应同时当它是一部理论和思想的书看。因唐代人对政治上的种种理论和思想,都已在此书中大部具体化制度化了。制度的背后,都应有理论和思想。一切制度决不会凭空无端地产生。若我们忽略了中国以往现实的政治制度,而来空谈中国人以往的政治思想,也决无是处。”^②钱穆更加看重《周礼》背后的制度思想,这对后人是极有启发的,当代有论者亦指出:“《周

① 刘起釪:《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页。

②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礼》的真正价值不在其制度设计,而在其赖以进行制度设计的更为根本的原则精神。”^①对“十三经”等典籍的阅代与当代继承,最为重要的,都是寻求经典背后的“更为根本的原则精神”,比如《周易》,当下不是要继承其占卜的观念与方法,而是继承周流其中的自强不息、刚健不已、阳光积极的处世态度,以及渗透其中的天地、阴阳等原初哲学观念;又比如《尚书》,并非一定要胶着于今、古文之争辩,而是对之中治理经验的继承,并且将之应用于当下的生活中,等等,这些“原则精神”,才是经典永远无法祛除的魅力,对这些“原则精神”的探掘,是一代又一代人致敬经典最根本的动力。

对于《周礼》,其背后的“原则精神”,可以发掘的层面多种多样,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探究这种“原则精神”,本章对《周礼》廉政思想的分析,都是这样一种探究的结果。而且,这种探究是一个不会终结的敞开过程,不同时代的人的探究总会有想要的收获。

在当代,对这种“原则精神”的探询,首先要看到,《周礼》作为中国官僚系统设计的专典在中国行政体系设计中的源头性。虽然,《周礼》的研究者搜罗证据,一再指出《周礼》是“理想国”的制度设计,大多数时候并未真正运用于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即使有应用,也以失败告终。这种论点似乎完全忽略了,中国制度长期变迁中的那种永远无法割弃的渊源性。《周礼》即使成书于汉季,在汉之前,如此完备的制度设计专典,绝无出现,这本身就能使《周礼》在历代制度设计中,具备不可绕避的参考功能。最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周礼》作为“十三经”之一,被官方厘定为修习常典,这种长期的修习,一方面,将《周礼》中的制度性内容最大可能地烙刻在中国人的思维中,特别是参与制度建设的历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思维中;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思维中有了这种积淀,历代制度建设者总会或多或少地从《周礼》中寻找可供支撑的智性因素,《周礼》的制度力量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进入到中国几千年的制度文明中,成为稳定的制度传统。《周礼》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在任何时代的制度设计中都能找到身影,而官僚系统中的廉洁、法治、民政、

① 黄玉顺:《“周礼”的现代价值究竟何在——〈周礼〉社会正义观念诠释》,《学术界》2011年第6期。

教育、土地、军制、礼制等宏观的制度框架,即使是现代制度规划,也大致都在这些大范畴内进行补充、更新,所以,考察中国的制度文化,不能无视这种始自《周礼》的制度传统的延续性,可以说,中国绵远流长的制度文化,就是在《周礼》这样的源头性制度典籍中滋养生成的。当代《周礼》的研究者,一定要看到《周礼》对历代制度建设,包括当代社会的制度建设的滋养性,必须将《周礼》的制度意义放到中国制度文化的传统中予以考察,《周礼》的制度意义才会凸显出来,这便是《周礼》背后最本根性的“原则精神”。

若将《周礼》置入制度伦理学的视角来观照,《周礼》的制度意义会更加显明,《周礼》背后“原则精神”的更多面相也更能彰显。

制度伦理学的研究“是从制度的角度,实现人的伦理原则与目标”。“在伦理学视域中,制度伦理是指以制度为框架与载体的伦理思想,或者说,是制度所蕴含的伦理精神与伦理价值,具体是指人通过制度来实现的原则与目标。简言之,制度伦理所主要涉及的,是制度规约下人的活动原则与实践目标。”^①伦理原则如何融入制度,这是制度伦理学要考察的一个方面,制度如何体现伦理原则,这是制度伦理学要考察的另一个方面。制度伦理学的研究目标和原则非常明确,正如有研究成果指出:“从制度伦理研究的目标来说,制度伦理的本质是以构建适合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良序社会为目标,研究如何实现社会制度与个人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伦理关系的一种理论体系。”^②刘月岭的博士论文《马克思制度伦理思想研究》也指出马克思制度伦理思想的根本目标:人的解放与自由是根本目标,马克思制度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是自由的原则、平等的原则、发展的原则、民主的原则。^③在制度伦理学的这种观照视野里,《周礼》的制度伦理意蕴,极值得总结,并足以启发当代的制度建设。

《周礼》将中国人最基本的哲学观念融入了制度设计,这是《周礼》制度设计的中国气质。彭林等人的研究早就指出,《周礼》以阴阳五行观念作为

① 刘月岭:《马克思制度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② 刘春滚:《制度伦理视域中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研究》,南昌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③ 参阅刘月岭:《马克思制度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